

西南联大研究文库

西南联大·闻一多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 知识分子

闻黎明 著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西南联大研究文库

西南联大·闻一多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
知识分子

闻黎明 著



人民
文学
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娜

封面设计:石笑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南联大·闻一多: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闻黎明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01-016315-4

I. ①西… II. ①闻… III. ①西南联合大学-文集②闻一多(1899—1946)-
人物研究 IV. ①F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1704号

西南联大·闻一多

XINAN LIANDA WEN YIDUO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

闻黎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32

字数:413千字

ISBN 978-7-01-016315-4 定价:66.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总 序

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抗日战争时期，为延绵教育与文化命脉，原设北方著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被迫南迁。初，辗转长沙，于1937年11月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无奈南京陷落，战火危及衡湘，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迁至昆明，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虽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但“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①，在极度简陋和艰苦的环境中传薪播火，弦歌不辍，共济时艰，“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②。其时其地，大师云集，学术灿然，人才辈出。据统计，1948年中央研究院81名首届院士中有联大教师27位；截至2004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有联大师生17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名获得者中，联大师生有8位；联大学生杨振宁、李政道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联大师生黄昆、

①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2 西南联大·闻一多
XINAN LIAN DA WEN YI DUO

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先后获得 2001、2003、2005、2007、2012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作为一所战时大学，西南联大谱写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硕而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长期以来，西南联大的办学模式、办学理念、办学经验仍为中外教育界、学术界追忆与推崇。在艰苦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为何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为何会对中国的现代教育和科技发展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这些问题受世人关注，值得深入研究。因此，“西南联大”不仅是一所大学的名称，而且也是一座具有丰富文化宝藏和悠久历史传统的圣殿，它日益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研究西南联大，就是要汲取西南联大成功的办学理念和科学精神，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使西南联大的精神永放光芒。

目前，对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已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研究者已注意从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知识分子问题等方面进行多维研究。但现有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深化、细化。诸如：感性回忆多，有价值、工具性的史料少；原始数据和文献堆积、编排多，理论分析、理论阐释少；论述平面化，面面俱到，史论结合有限；多为单一学科的局部研究，缺少学科交叉，对现实的借鉴不够等。西南联大的历史地位，尤其是西南联大对云南的影响，在经济、政治、科技方面推动云南社会发展的深层分析等是西南联大研究下一步需要努力的方向。

基于云南师范大学与西南联大一脉相承的关系，无论从云南师范大学的责任和发展着眼，或者基于云南省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需要，还是从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发展来说，西南联大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不仅应该成为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省重要的学术、文化品牌，而且更应该成为全国研究西南联大的学术重镇和首屈一指的学术交流平台。因此，研究西南联大，我们责无旁贷。云南师范大学一贯重视和支

持此项工作。2001 年学校成立了西南联大研究所，下设“西南联大研究中心”和“西南联大文献研究中心”，并提出了“集资料、研究、宣传”为一体的发展思路，且确立了建设具有较大影响的开放式研究中心的发展目标。通过资源整合，在图书资料方面，学校建成“西南联大文库”和“西南联大特藏室”；相继开通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网站，“西南联大博物馆”网站、微博、微信，集西南联大历史文化传播、办学精神研究等为一体，在加强国内外学者对西南联大的研究和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均起到促进作用。在学生教育方面，学校招收了西南联大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着力于培养西南联大研究人才。在学术交流方面，由西南联大研究所主要承办的“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连续召开，为国内外西南联大研究者搭建了交流、对话的平台，会议规格之高、学术性之强、辐射面之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和强烈反响。

毫无疑问，西南联大研究所成立以来，在全体同人的一致努力下，业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产出了一批理论研究成果，且通过研究所的平台作用，汇集了西南联大研究方面的一批力量，推动了西南联大研究的发展。

《西南联大研究文库》就是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和云南西南联大研究会在发展道路上共同推出的又一力作，也是着力打造全社会共享的西南联大文化资源的一个尝试。本套丛书旨在汇集全国乃至全世界西南联大研究者的力量及其成果。通过这些开拓创新、高起点、多角度的研究，推动西南联大研究的发展，以此建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研究西南联大的重要基地、一流的研究中心和信息资料中心，并依托高校的学科建设，使其研究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高等教育的发展。

自序

小时候，我是在外爷身边长大的。20 世纪 20 年代初，外爷在上海大学读书，是陕北山沟里走出来的革命先驱。他对我这个唯一的外孙疼爱有加，常常给我讲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故事，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受到耳熏目染，逐渐对历史产生浓厚兴趣。但是，把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还是在北京大学求学之后。

1968 年 6 月，在“上山下乡”大潮刚刚兴起的时候，我怀着当年青年人都有的热情和憧憬，从北京奔赴北大荒，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十二团的一名战士。1970 年冬，父亲所在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被定为“斗批散”单位，父亲第一批离开中央统战部，远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国务院宗教局工作的母亲虽然不在“斗批散”之列，但也毅然与父亲一起离开北京。他们出发前，我从黑龙江赶回北京送行，见父母已经把家里积存的图书都打了包，准备处理掉。这些书，那时都被视为“封资修”，可在我心里，它们却很宝贵，觉得早晚总会用得上。于是，我挑选了一些，装了满满两大箱子带到了北大荒。

这批图书，除了少部分是对我有启蒙意义的青少年读物外，大多数是春秋列国、秦汉三国、唐宋文化之类的作品，其既有楚辞、论语、孟

子、史记、唐诗、宋词，还有《三字经》《百家姓》等。当然，那时我不可能认真阅读这些图书，只是潜意识中把它们当作值得保存的文化典藏，心想总有一天会进入这个天地的。

1969年初冬，我从生产连队调到团政治处报道组，不久就得了一次肾炎。住院期间，我闲下无事，就借助前辈的成果，把《楚辞》全篇从头到尾注释了一遍。那时还是“文革”时期，环境不允许公开阅读这类图书，好在大家善解人意，翻了翻《楚辞》，什么也没说。不过，一位朋友趁我不在的时候，从我箱子里翻去几本书，虽然只是岳飞、文天祥、方腊等历史人物传记，却被保卫处一位现役军人发现，当即扔进火里烧了。1971年春讨论我加入共产党时，这件事还被提了出来，多亏我的直接领导、政治处主任李楚华心胸宽宏，用“年轻人嘛”几个字把问题淡化了。

1974年秋，我有幸走进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成为历史系中国史专业的工农兵学员。在北大的三年里，课堂教学满足不了我的求知欲望，我常私下到几位还在被批判的老师家里，向他们请教治学之道，去得最多的是清史专家商鸿奎先生和明史专家许大龄先生的家里。说到这儿，我要感谢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徐化民老师，他不仅从未对我有过指责，反而多次给我种种鼓励。

按照我的愿望，本是想从事古代历史研究。1977年夏毕业前夕，历史系已决定我留校任教，徐化民代表系领导找我谈话，说准备让我到先秦教研室，还说要送我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习。其后，出现了一些波折，我没有留校，而是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通史研究室。通史研究室原是我们老所长范文澜先生为撰写《中国通史》成立的一个班子，这部书只完成了前四卷，范老去世后，由蔡美彪先生主持，继续撰写范老没有完成的后六卷。不过，我到近代史研究所后，蔡美彪先生接受了国务院布置的编辑《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任务，把我调去参加该书第一卷（上古至元末）的编辑工作。那段时间，为了查找历

史资料，我阅读了大量古代史著作，初步接触和了解了一些史学大师的治学路径与方法。

《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工作结束后，我回到近代史研究所，本想可以按照原先的分工开始研究明清学术，可那时《中国通史》已基本写完了，通史研究室的同事们需要重新选择工作。这时，研究所党委书记郭冲征求我的意见，建议我转到近代史研究领域，并提出中外关系和文化史两个研究室，让我选择。我把这个意思向蔡美彪先生做了汇报，他认为这两个研究室对我都不合适，恰此时荣孟源先生在“文革”前主持的《北洋军阀》大型资料集决定恢复编纂，经和我一起编辑地震历史资料的章伯锋先生推荐，荣先生希望我担任他的助手。我想，对于中国近代史，无论是哪个领域，我都得从头做起，能跟随荣先生这样的大师，肯定能获益匪浅。于是，还没有确定研究方向的我，就这样转到荣先生所在的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从此跨入近代史研究的门槛。

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荣孟源先生主持的《北洋军阀》大型资料集的编纂，并没有立即展开，这个间隙使我有充足的时间，并迈入闻一多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

这事说起来也是偶然。1984年，全国第一次闻一多学术研讨会在湖北黄石召开，我因祖母病重，没有参加黄石会议，但会后看到了寄来的论文。这些论文，给我的总体感觉是重复居多，突破有限。1985年，我参加了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第二次闻一多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论文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而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是资料来源还显得比较薄弱。自己应该为改变这种状况做些什么呢，我暗暗地想，一股从未有过的冲动就这样突然出现了。

这要感谢编辑地震历史资料时受到的训练。编辑地震历史资料时，我阅读过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两部著作的体例容纳了相当多的第一手材料，是史学研究最基本的资

料之一。何不仿照它们的体例，把闻一多资料也系统编纂出来，使之能够为闻一多研究者提供最大的便利。这个念头产生后，逐渐形成了《闻一多年谱长编》的最初结构。

在研究室同人的支持下，我从1985年冬开始收集资料，用五年时间完成了《闻一多年谱长编》。其间，我除了尽量利用现有资料外，还走访或信访了多位闻一多的同学、同事、朋友，查阅了大量报刊、档案。《闻一多年谱长编》出版时，版面字数86万字，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一时很难被已经开始讲求经济效益的出版社接受，所以迟至1994年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等待出版的期间，张光年先生鼓励我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撰写一本《闻一多传》，结果后写的《闻一多传》反倒比先写的《闻一多年谱长编》早两年问世。这两部书都产生了一定影响，《闻一多传》被日本早稻田大学铃木义昭教授译成日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闻一多年谱长编》则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经40多位大师匿名评选为向研究生推荐的古今中外60部必读选读书目之一。

收集闻一多资料的过程中，我见到了许多与西南联大相关的珍贵材料，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思想、文化、军事、国际关系、边疆建设等等。我很吃惊西南联大居然还有这么多被人忽视却极有价值的史料，心想这些空白总有一天需要填补的。于是，我在抄录闻一多资料时，也将西南联大一些重要线索保存了下来。这样，《闻一多年谱长编》完成后，我的精力就很自然地转移到西南联大研究方面，陆续把自己的认识撰写成论文。2009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有一些部分就是经过八年冷处理后的阶段性成果，本书所收者，也是西南联合大学研究与闻一多研究的若干心得。

本书是从历年论文中选择出来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同类性质的文章也不断充实改进。选择需要标准，本书的标准有二，一是史实上具有填补和充实价值者，二是观点上有所突破和

创新意义者。

书中第一部分为西南联合大学研究，收入论文十三篇、书评一篇，内容涉及西南联大的战时生活与心理变化、国际形势的观察分析、对于抗战建国最高国策的理解与实践、直接投身抗战前线的青年从军、支援边疆建设的地方教育、关于处置日本的认识、战后建立永久国际秩序的思考、联大教授的群体性转变等。这些问题，均建立在大量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有些问题首次纳入西南联大研究范畴，相信对拓展这一研究有一定价值。

本书第二部分为闻一多研究，收入论文七篇、后记一篇。由于血脉和知识结构关系，我尽量回避对闻一多进行评论，也从不对学术界的议论发表意见，因此自己在这方面的成果，多是在海外高校的报告，内容为了适应听众，主要是宏观介绍与个案考察。这些论文中，《李闻惨案之善后》耗时最久、用力最多，从提出问题、框架修改、资料补充，前后历经十余年，仅中国台湾就前后去了五次，几乎查遍了保存在台北“国史馆”、台北“中央研究院”、国民党党史会的蒋介石、国民政府、王世杰、朱家骅等档案。这部分的末篇《〈闻一多年谱长编〉后记》，因记录了本人从事闻一多资料编辑整理的初衷、过程及治学体会，考虑到对年轻学者或许有益，也一并收入进来。

本书非专著，各篇成文时间不一，内容也不连贯。尽管如此，它毕竟是自己从事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历程的一个记录，所以敝帚自珍的同时，也深望接受历史与读者的检验。

闻黎明

2016年2月5日 海南·三亚湾初稿

2016年3月29日 东京·小山田樱台定稿

目 录

自 序.....	1
----------	---

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篇

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小长征”述论.....	3
“跑警报”：西南联大战时生活研究之一.....	35
“国民大会议政会”刍议.....	50
——西南联大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对“五五宪草”政体制度的 修正设计	
“有田—克莱琪协定”在西南联大的反响.....	72
抗战胜利前后西南联大精英的美国观.....	91
西南联大教授对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若干思考.....	109
西南联大“五四”纪念述论.....	128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远征军.....	152
西南联大与云南中等教育师资培养.....	186
论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	206

论“一二·一”运动中的大学教授与联大教授会	230
“一二·一”运动中去李（宗黄）问题研究	258
《梅贻琦日记选》书后	282
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书后	300

闻一多研究篇

五四时期的闻一多	313
闻一多与 1921 年清华学生“同情罢考”事件	341
闻一多与“大江会”	362
中国近代文化和政治史上的闻一多	389
闻一多的诗经学研究轨迹	405
闻一多文化观的发展轨迹	424
李闻惨案之善后	438
《闻一多年谱长编》后记	482
后 记	493



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篇

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小长征”述论

1938年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前身长沙临时大学西迁云南时的“小长征”，是抗战初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组之这所高等学校为顺利迁徙昆明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这次历经68天，横越湘黔滇三省，跋涉3500里的“小长征”，在抗日战争史甚至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它不仅是西南联大的自豪与光荣，也是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近年来，由于西南联大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作用的不断显现，国内外史学家开始将目光投向这所高等学校，“小长征”的研究自然也成为课题之一。

对于这次“小长征”的记录，最早出自参加者的笔下^①，史学界的

① 最早报道这次旅程的是长沙临时大学外文系三年级学生林振述，1938年春他以林浦为笔名在《大公报》副刊《小公园》上发表了旅途中的日记二则。同年10月，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向长清也在巴金主编的《烽火》杂志第20期上发表了《横过湘黔滇的旅行团》。与这些短小文章相比，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南三千五百里——从长沙到昆明》一书，则是政治系二年级学生钱能欣根据途中日记整理而成，这部著作第一次较为完整地介绍了湘黔滇旅行团的全貌，从而使人们对这一事件留下深刻印象。1946年夏，西南联大复员前夕，该校学生出版社出版的《联大八年》亦收入了参加这次“小长征”的生物系教师吴征镒先生的《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这篇长文随着其书的流传，曾被各种著述所征引。

4 西南联大·图一多
XINAN LIANDAI WEN YIDU

关注则是结合西南联合大学纪念活动展开的^①。目前，国内出版或发表的研究西南联大之著述，均给予这段历史充分肯定。值得重视的是，较早对“小长征”进行系统介绍的竟来自国外。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斯雷尔所著之《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以“从长沙到昆明：西南联大的长征是历史也是神话”为题，以整整一章叙述了这段过程。^②而日本同志社大学的楠原俊代教授，更是在其长达350余页的《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③一书中，几乎用一半篇幅介绍这次“小长征”。

上述成果，为了解这次“小长征”提供了扎实的基本史料，但由于多数论述一般着重于“小长征”的过程记录，故本文意在在对“小长征”进行归纳梳理的基础上，并就某些密切相关却被忽略的问题略呈一管之见。

① 1996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历经13年耕作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问世，书中虽然对“小长征”的记述仅有一小节，但由于作者的身份，无疑使其在同类著作中具有最可信的权威。其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寄谦先生在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和西南联大校友的通力支持协作下编辑的《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纪实》，199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真实的记录”为图片资料，收有湘黔滇途中所摄之200幅珍贵照片；第二部分“历史的进程”为文字资料，收入档案文献、“小长征”参加者的回忆、书信、日记等大量第一手资料，可谓是目前介绍这一史实之集大成者。

② 伊斯雷尔教授（John Israel）中文名“易社强”，哈佛大学博士，是美国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费正清教授的学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1946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出版的《联大八年》一书，受到很大震动，随后对西南联大校史进行了多年研究。其所著之《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笔者虽未目睹该书，但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和《西南联大在蒙自》两书中，见有其摘录译文。另外，易社强教授的《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合大学》，亦刊登在《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中。

③ 楠原俊代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其《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又一次长征，通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路》一书，日本研文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